

成功的失敗者——

張學良
傳



九 · 一八，九 · 一八



慷慨悲歌

九·一八，九·一八，

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，

脫離了我的家鄉，

拋棄那無盡的寶藏。

流浪！流浪！

整日價在關內流浪！

哪年，哪月，

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？

哪年，哪月，

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？

爹娘啊，爹娘啊，



什麼時候，
才能歡聚一堂？！

這首最先在西安校園唱開，而後又響遍多個城市街頭的《松花江上》，我是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上了初中才聽到的。那蒼涼悲慨、淒婉動人的歌聲，一下子就把我的「少年心」緊緊地攫住了，聽著，聽著，眼淚便「刷刷刷」地流淌下來。

音樂本身就具有移情動性、感發興起的功能，加之身在曾經淪為殖民地的東北，有著直接的生活經歷與生命體驗，因此，那迴環縈繞、反覆詠唱的旋律，像是旋動著的一顆螺絲，一步步把激揚澎湃的情感推向頂端，直如萬箭攢心，肝腸欲斷；最後竟達到這種地步，只要一提到「九·一八」這三個字，耳畔便立刻蕩起這悲涼、憤懣的歌聲。

後來，我讀了民國年間的東北史，又陸續看到一些有關張學良將軍的史料，知道原來史冊上是記載著兩個「九·一八」的。——在那個舉國上下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的「九·一八」事變的前一年，一九三〇年也有一個轟動全國的「九·一八」。二者不同的是，前一個把張學良推上榮譽的巔峰，後一個使他墮入恥辱的泥淖。時隔一年，他就由光華四射的耀眼明星，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，真是「世事茫茫難自料」啊！

前一個「九·一八」

一九三〇年中原大亂。經過頻繁的幕後活動，李宗仁、馮玉祥、閻錫山等各派勢力，公開亮出

了反蔣旗幟，他們一致擁戴閻錫山為「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」，逼迫蔣介石下臺。當時唯一沒有捲入這場戰事的，是雄踞山海關外、同樣手握重兵的張學良。在鬥爭雙方旗鼓相當、相持不下的情勢下，顯然，當時有「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顆新星」之譽的張學良，「左袒」則左勝，「右袒」則右勝，輿論公開地宣稱：「誰贏得了少帥的支持，誰就贏得了這場戰爭，甚至就能贏得整個中國。」因而，他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，受到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，地位驟然凸顯出來。於是，交戰雙方都費盡心思尋覓能與張氏拉上關係的人物，瀋陽城裡，冠蓋雲集，帥府樓前，說客盈門，都竭力爭取東北軍的支援。

形式上，張學良嚴守中立；內心裡卻已經意有所屬，那就是南京政府。因為他一貫以維護國家和平統一為旨歸，在他看來，蔣介石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理想人物。他先是致電閻錫山與馮玉祥，認為「戰爭對外則為恥辱，對內為人民所不取」，表示「如能同意罷戰，願執調停之勞」，結果遭到拒絕。於是，在九月十八日，張學良發出了轟動中外的通電，主要內容是：

戰端一起，七月於茲，廬舍丘墟，人民塗炭，傷心慘目，詎忍詳言！戰局倘再生長，勢必致民命滅絕，國運淪亡，補救無方，追悔何及，此良栗栗危懼者也。

……良委身黨國，素以愛護民眾、維持統一為懷，不忍見各地同胞再罹慘劫，用敢不揣庸陋，本諸「東電」所述，與夫民意所歸，籲請各方，即日罷兵，以紓民困。至解決國是，自有正當之途徑。應如何補救目前，計劃永久，所以定大局而饜人心者，凡我袍澤，均宜靜候中央措置。

電文語意含蓄，措辭溫和，並未明顯指責某一方，但由於文中有「靜候中央措置」字樣，客觀上已經彰顯了他的立場，因而在整個政界鼓蕩起一場軒然大波。即此，亦足以見出當時他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電文發出後，張學良即調遣十多萬東北精銳之師，浩浩蕩蕩開入關內，反蔣聯盟聞風潰退，迅速瓦解。閻錫山在地上往復兜圈子，邊走邊說：「完了，完了！咋個辦呢？咋個辦呢？」立即宣布辭去「總司令」之職；隨後，與馮玉祥所率軍隊全體將領聯名覆電張學良：「今我公慨念時艱，振導祥和，凡有血氣，莫不同情」，「究竟如何循正當之途，以定國是，敬請詳示。」至此，軍事調停宣告成功，從而結束了民國史上為時最長、投入兵力最多、付出代價最大的一場內戰。僅用十幾天，東北軍就平定了華北，平、津、河北政權由東北軍全部接收。

很快，張學良就接任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職。到達南京時，受到了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最高規格的接待，禮遇之隆重，報章上說是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。當張學良一行由浦口過江時，江中的軍艦和獅子山上的炮臺，禮炮齊鳴，向他表示敬意；船至下關碼頭，早已恭候在這裡的國民政府各路大員，齊聲問候，鼓掌歡呼；驅車上路，目光所及，滿城都張貼著「歡迎擁護中央、鞏固統一的張學良將軍」的巨幅標語；進了國府大門，蔣介石以對等身分，降階相迎。

為了酬答張學良的勳勞，蔣氏授予他節制奉、吉、黑、晉、察、熱、綏、魯八省軍隊之權柄，並將北平、天津、青島三市及河北、察哈爾兩省劃歸奉系管轄。儼然與這位未及「而立」之年的少帥平分天下，共掌朝綱。張學良一時位極「人臣」，權傾朝野，其政治生涯可謂登峰造極，也是他人生最為得意的時刻。這飛來的榮譽，不禁使他有些飄飄然，甚至忘乎所以了。說來也不出奇，畢

竟他還很年輕嘛！

後一個「九·一八」

月盈則虧，物極必反。得意，是一種很可怕的心態。正如古語所說的，「福兮禍所伏」，少帥輝煌的榮耀，至上的威權，也埋伏下危機的種子。

就在他統率十餘萬精銳之師揮麾入關，致令東北兵力空虛，而八省三市冗雜的善後事宜亟待處理，無力顧及東北防務的嚴峻時刻，密切關注、伺機待動的日本關東軍，早已磨刀霍霍，殺氣逼人。於是，一場陷他於滅頂之災、使他遭受奇恥大辱的另一個「九·一八」，正在暗地裡悄悄地等待著他。

一九三一年夏天，張學良因患重症傷寒，入住北平協和醫院診治，入秋之後漸漸恢復。九月十八日晚，東北軍政要員為遼西特大水災籌措救助基金，在前門外中和戲院舉行盛大京劇義演，著名青衣梅蘭芳領銜演出《宇宙鋒》。各國駐平使節及當地仕商名流應邀出席。病後初癒的張學良也一道前來觀看。正當全場沉浸在精美絕倫的藝術享受之中，少帥突然被緊急電話喚出，原來，一場震驚中外的事變在瀋陽的柳條湖發生了。

當晚二十二點二十分，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奉天北大營附近柳條湖的一段南滿鐵路，並扔下三具穿著中國軍服的屍體，誣稱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，襲擊日軍守備隊。於是，參加夜間「演習」的關東軍各部隊，分別向北大營、奉天城等預定目標發起攻擊。當時，中國士兵群情激憤，要立即予以反擊，可是，旅長卻下達了張學良發出的「不予抵抗」的指令，當時還有這樣的話：「繳械任其

繳械，佔領營房任其佔領營房。」結果，到了第二天上午八時，陸續得到增援的日軍幾乎未受到任何抵抗，便佔領了整座城市，東北軍被迫撤向錦州。當時全國最大的、擁有五萬名工人的瀋陽兵工廠，連同九萬餘支步槍，兩千五百挺機關槍，六百五十餘門大炮，兩千三百多門迫擊炮，東北航空處的二百六十餘架飛機，以及大批彈藥、器械、物資等，全部落入日軍之手。爾後，四個月零十八天，就佔領了相當於日本本土三倍的整個東北。

難道是真的活見鬼了?!為什麼張學良竟然鬼迷心竅，做出這樣既悖常情、又乖公理的決定？不妨追溯幾件近期發生的事情，也許可以給出一定的答案。

前此一兩個月，因為「萬寶山事件」、「中村事件」，引發了全國風起雲湧的抗日怒潮，蔣介石對此十分光火，當即在「剿共」前線，電告南京政府與張學良：

無論此後日本軍隊如何在東北尋釁，我皆不應予以抵抗，力避衝突。吾兄萬勿逞一朝之憤，置國家民族於不顧。希轉飭遵照執行。……宜隱忍自重，以待機會，以免被共產黨利用，逞共匪之跋扈，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場紛亂之虞。

事變發生前幾天，蔣介石又當面向張學良交代：

最近，我獲得了可靠的情報，關東軍在東北就要動手。我這次和你會面，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，凡遇到日本進攻，一律不准抵抗。如果我們回擊了，事情就不好辦了。你的身體不

好，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交給中央。

這就是說，張學良的下令不抵抗，是奉行了蔣介石的既定方針。

其實，這種不抵抗的政策也並非蔣氏所獨創。可以說，近代以來的歷屆中國政府，對於英、法、美、日、俄等各國列強的侵略挑釁或中外局部性衝突的處理，大多持讓步、妥協、忍耐及不抵抗的態度，幾十年間，幾成慣例。他們還美其名曰：這是另一類的愛國主義——弱者面對強者，出於最低限度的自我保護，只能忍辱負重，在夾縫中求生存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蔣介石師法曾國藩當年處理洋人與太平軍關係的故伎，將「安內攘外」確立為國民政府的一項基本方略，而不抵抗政策不過是這一方略的邏輯推演與必然延伸。因為他一向把眼皮底下的共產黨看成心腹大患，而視東北邊陲之外、蠢蠢欲動的日本人為「成不了氣候的敵人」。他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《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》的文告中，指出：「攘外應先安內，去腐乃能防蠱」；「不先消滅赤匪，恢復民族之元氣，則不能禦侮；不先削平粵逆，完成國家之統一，則不能攘外。」

可是，具體落實到張學良身上，就另當別論了。他是一個「愛國狂」，國仇家恨集於一身，對日本鬼子早已切齒痛恨，不共戴天；此刻，面對強敵入侵，國土淪亡，東北三省父老鄉親慘遭荼毒，他又怎能坐視不顧、置若罔聞呢？況且，以他那樣一個「天不怕，地不怕」、敢作敢為、我行我素的強牛猛虎，蔣介石只憑著幾句囑託，一紙飭令，就能把這個「東北硬漢子」的手腳捆綁住嗎？

我們且聽聽張學良自己是怎麼講的：

要說我就是不想抵抗，我是一點不服的。但是你要責備我一句話，說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，東北那麼大的事情，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——我還是把這時的日本看做是平常的日本，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，我對這件事情，事前沒料到，情報也不夠，我作為封疆大吏，我要負這個責任……

我情報不夠，我判斷錯誤！我的判斷是，日本從來沒敢這麼擴張，從來沒敢搞得這麼厲害，那麼，現在它仍然也不敢。我也判斷，這樣幹，對你日本也不利啊！你要這樣做法，你在世界上怎麼交代？那個時候，我們也迷信什麼九國公約、國聯、門戶開放，你這樣一來，你在世界上怎麼站腳？

原來如此！

三個「錯誤期待」

揆情度理，設身處地，張學良這麼講，應該說是可信的。但是，新的一系列問號又隨之跳了出來：

作為封疆大吏，守土有責，為什麼你事前竟然沒有料到？

為什麼「情報不夠」？作為最高指揮官，難道不曉得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」的兵法常規嗎？

縱使事變當時猝不及防，為什麼戰局拉開之後，日本軍隊一日之內下我二十城，掠地千餘里，就是說，他們已經動真格的了，作為軍事統帥，你還是拒不抵抗呢？

本著中國傳統史學「春秋責備賢者」之義，尋根究底也好，「誅心之論」也好，這些疑問都是無法迴避的。

其間的癥結所在，是他事變前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缺乏清醒的認識。他說：「我的判斷是，日本從來沒敢這麼擴張，從來沒敢搞得這麼厲害，那麼，現在他仍然也不敢。我也判斷，這樣幹，對你日本也不利啊！你要這樣做法，你在世界上怎麼交代？」之所以如此，不能不歸咎於他在整個時局面前，得意忘形，心浮氣躁，自恃雄強，而放鬆警惕。既然東洋鬼子「不過爾爾」，那也就用不著隨時掌握什麼「情報」、分析什麼「動向」、研究什麼對策了。

而在戰局拉開之後，面對日本軍隊勢如破竹的凌厲攻勢，他又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，由原先的滿不在乎，一變而為「悚然驚懼」；接下來，產生了三個「錯誤期待」、一個「深層考慮」。

所謂「悚然驚懼」，是在他看來，「我以東北一隅之兵，敵強鄰全國之力，強弱之勢，相去懸絕」；「日軍不僅一個聯隊，它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，絕非我一人及我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。」這裡不排除有過高地估計敵軍實力的偏向；但日軍蓄謀已久，成竹在胸，進而積聚足夠的兵力，打有準備之仗，也是鐵一般的事實。當時，東北境內的日本正規軍，包括一個師團和六個鐵路守備隊，另有持槍的員警、憲兵、特務團、義勇團等名目繁多的輔助軍事力量，總數在十萬人以上。

三個「錯誤期待」：一是期待當時的國聯出面干涉，企盼英、美等西方國家制止日寇的侵略行為。當李頓爵士率領國聯調查團到達東北時，張學良曾樂觀地認為，一俟調查清楚後，當會採取措施幫助中國，制止日本侵略。二是期待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改變不抵抗的政策，在全國掀起全面抗戰。事變當時，張學良曾對東北高級將領說：「現在我既聽命於中央，所有軍事、外交均係全國

整個的問題，我們只能速報中央，聽候指示。我們是主張抗戰的，但須全國抗戰；如能全國抗戰，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，是義不容辭的。」三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關東軍對中國東北的野蠻侵略。由於這三個「期待」均沒有現實依據，因而，最終全部淪為甜蜜蜜的幻想。

而其「深層考慮」，則是擁兵自重，保存實力。張學良畢竟出身於地方軍閥，他所念茲在茲的必然是手下的軍隊，這無異於他的「命根子」、「護身符」。他曾對部下說：

當時，從政治和戰略上分析，敵強我弱，假如違令抗日，孤軍作戰，後繼無援，其結果不僅有可能全軍玉碎；更為嚴重的是，唯恐給東北同胞帶來戰禍，造成極大的災難。為了避免無謂的犧牲，保存實力，所以我忍辱負重，暫率東北軍退出東北，臥薪嚐膽，同仇敵愾，整軍經武，提高部隊素質，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，消滅日本侵略者。

對於他來說，「中東路事件」的教訓是至為慘痛的。本來是蔣介石下令出兵，並答應一旦開戰，中央將派出十萬援兵全力支持。可是，當與蘇軍交戰後，竟致一敗塗地，東北軍損失慘重，而蔣介石卻未派一兵一卒，坐視不救。到頭來，只有大呼上當，自認霉頭。中央發令的事，結局尚且如此；如果違抗中央命令，擅自行動，後患將更加不堪設想。應該說，這是他擁兵自保、不予抵抗的深層原因。

不諉過

至於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方針，在張學良來說，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。追根溯源，可說是「久矣夫，非一日也。」張學良自幼就痛恨軍閥割據，各霸一方，造成國家分裂，民生凋敝；而把蔣介石統治下的南京政府視為統一的象徵，對其寄予深切的希望，並自覺自願地將自己與東北軍置於被統領、被調遣的地位。一九二九年，蔣介石命令他收回中東路，他即出兵與蘇聯作戰；後來，石友三部叛變南京政府，他即刻應調，率兵平叛。在他眼中，蔣氏即是中央，中央即是統一政府，他把服從中央政府的調遣看作軍人應盡的職責。也正是基於這種情況，幾十年來，社會各界才一致認為，張學良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，才導致東北淪陷，最終成了「替罪羊」的。

據張學良的「口述歷史」披露，關於這段歷史，他有如是說法：

我是主張抗日的。但在蔣先生心裡，他的第一敵人是共產黨。能保持他的政權，他什麼也不管。他是老謀深算的政客，我是很年輕的。……蔣先生是個投機取巧型的買辦，完全是唯我的利益獨尊主義。

同時，他還這樣說：

我要鄭重地聲明，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。「九·一八」事變不抵抗，不但書裡這樣說，現在

很多人都說，說這是中央的命令，來替我洗刷。不是這樣的。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，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，不是的，絕對不是的……

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，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，他來挑釁，你離開他，躲開他。

我簡單地講這個道理，講這個事實。日本人在東北同我們搗蛋不是第一次了，他搗了許多年了，搗了許多次了，每次都是這樣處理的嘛……

當晚，根本不知道這就叫做「九·一八」事變，也不知怎麼向政府請示該怎麼辦。因為那時關東軍經常尋隙挑釁，隔幾天就找點事鬧鬧……

我這個人說話，咱得正經說話，這種事情，我不能諉過於他人。這個事，不是人家的事情，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是我的責任……

我這個人是不受操縱的，但凡做事，我有我自己的主意，我有我自己的見解。

這番話，再一次顯現了張學良的個性特徵。「大丈夫要光明磊落，敢做敢當，不能功歸自己，過謗他人。」這是他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。

事情其實也很簡單，就是各有各的帳。無論張學良如何奉行「忠恕之道」，面對日寇的瘋狂入侵，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，這是板上釘釘、洞若觀火的。

萬世羞

國土淪亡，山河破碎，激起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，紛紛指責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不抵抗行為。著

名的愛國學者王造時憤怒地指出：

古今中外的歷史，喪權的也有，失地的也有，甚至於亡國的也有，但決找不出喪失土地如此之多而不抵抗的例子。有之，只有「九·一八」一役！

實行不抵抗主義的人們，還有什麼理論可以自行辯護呢？失去東三省不抵抗，失去熱河不抵抗，將來失去華北恐怕還是不抵抗；不抵抗主義不但斷送了數百萬平方公里土地、數千萬的同胞，並且，貽我中華民族萬世之羞！

「九·一八」事變後，對於張學良，群起而攻之，甚至連吳佩孚都寫了諷刺詩：棋枰未定輸全局，宇宙猶存待罪身。醇酒婦人終短氣，千秋誰諒信陵君！

因為張學良被列入「民國四公子」，故有「信陵君」之喻；「醇酒婦人」，語含譏刺，顯然是從「張擁蝴蝶共舞」的謠言引申而來。當時的輿論，甚至連他陪同外賓觀賞京劇也有所責難，認為在千鈞一髮的危難之際，竟有閒情逸致去看戲，真可說是「陳叔寶全無心肝」。而在天津的日本特務機關報《庸報》，則故意捏造有關張學良的桃色新聞，上海有的報紙也大肆刊載這類消息。

辛亥革命黨人、在政界學界歷任要職、頗負詩名的馬君武，根據這些傳聞，在《時事新報》上發表了兩首《哀瀋陽》的七絕，並自詡堪與清初著名詩人吳梅村痛斥漢奸吳三桂的《圓圓曲》相媲美：

趙四風流朱五狂，翩翩蝴蝶正當行。

溫柔鄉是英雄塚，哪管東師入瀋陽。

告急軍書夜半來，開場弦管又相催。

瀋陽已陷休回顧，更抱阿嬌舞幾回。

從前面講到的情形看，事實顯然大有出入。但身為當事人的張學良，「戴盆難以望天」，除了一再申明：「第一，不屈服，不賣國；第二，不貪生，不怕死。倘有賣國行為，將我打死，將我的頭顱割下，也是願意的」；只有腆顏受過，打牙咽進肚裡。趙四小姐也取沉默態度，未置一詞加以辯解。唯有蝴蝶連續兩天在《申報》上發表聲明，鄭重進行批駁，說她「留平五十餘日，未嘗一涉舞場」；況且，同張學良從來就曾見過面。聲明中揭露，這是日本人的「宣傳陰謀」，「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，冀阻止其回遼反攻。」

而「朱五」則以另外一種方式，把這筆帳找了回來。「朱五」係北洋政府內務部長朱啟鈐的第五個女兒，名湄筠，是少帥秘書朱光沐的妻子。事後，在香港，她與馬君武在一次宴會上見面了，便端著酒杯走了過去，說：「馬老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『朱五』啊，來，我敬你一杯酒，感謝你把我變成名人啦！」馬君武現出一臉窘相，見勢不妙，慌慌張張地溜走了。

當時，同為京師「四公子」的張伯駒在《故都竹枝詞》中寫道：

白山黑水路淒迷，年少將軍醉似泥。

為問翩翩蝴蝶舞，可曾有夢到遼西？

——作者原注：「時東北已失，張學良在京方呢電影明星蝴蝶，每跳舞至深夜。」

顯然，他同樣也是聽信了報紙的傳聞，作了並不符合實際的口誅筆伐。

這種批評的風潮持續了很久，直到張學良宣布下野、出國，著名學者林語堂還在他主編的《論語》雜誌上登了一首打油詩加以調侃：

贊助革命丟爸爸，擁護統一失老家。

巴黎風光多和麗，將軍走馬看茶花。

就這樣，「閱盡人間春色」、頭上罩滿光環的張學良，一時間，竟成為一個萬口譏嗤、罪不容誅的醜惡角色；東北軍也被冠以「誤國軍」的惡名。

相對而言，著名詩人柳亞子的詩顯得客觀一些：

漢卿好客似原嘗，家國沉淪百感傷。

歐陸倦遊初返棹，夢中倘復憶遼陽。

大意是，張學良雖然行俠好客，卻未能率國士報國，這比平原君、孟嘗君等戰國時期的「四公子」更加不幸。而他縱然集家仇國難於一身，卻又不能明言「不抵抗」的真相，只能夢中憶念淪陷的鄉關暗自感傷。評判之餘，飽含深切的同情。

也許是因為這首詩深深觸動了少帥的私衷吧，他一直記憶在心裡，幾十年過後仍感懷不忘。

是呀，正如《松花江上》的歌詞說的，「哪裡是我們的家鄉」、「我們已無處流浪，已無處逃亡」。這個有國無家，在異鄉養育大的孤兒，夢裡還鄉，何止千次百次。只是，離別的時間實在是太久了，「奉天此日樓千百，只恐重來路欲迷」呀！